

论冯契对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贡献

——从哲学史定义说起

朱义禄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

摘要：冯契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对哲学史对象作了新的界说。他把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类的认识史，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摆脱了与阶级斗争相关的政治色彩，让中国哲学史走上了独立的理论研究的道路。

关键词：冯契；哲学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论及冯契先生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贡献，同对这一学科研究的历史回顾是分不开的。没有比较，就难以得出较为客观的见解来。冯契先生最大的贡献是对哲学史对象作了新的界说，定义为人类的认识史。现在看来似乎是常识性的东西，但在二十年前是那么的发聋振聩，以至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记得1979年初，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的逻辑发展》这一课程，刚刚讲了一学期。武汉大学到华东师范大学进修的一位老师，就借了我的上课笔记本携回武汉去。因为萧聿父先生急欲了解冯契先生的最近学术观点。当时萧聿父先生正组织一班子人，在讨论冯契先生的新见解。这只是亲知的一例，可能还有更多的此类情况。

（一）

要理解这一定义的解放思想上的开拓性意义，就得回顾一下建国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状况。大体上说，建国后三十年间，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规律是遵循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所下的结论。他在一次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作了个发言，“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的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所以，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 (P15)}把这一定义演绎到极致的是一本具有权威性的教科书。那就任继愈主编的三册本《中国哲学史》。全书共61章，其中8章系介绍历史背景的。余下53章中，章节中标明唯物主义的为25章，标明唯心主义的为19章，占全书的86%。内中明确地说，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在魏晋时期，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表现为魏晋玄学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有嵇康、阮籍、裴頠、杨雄、欧阳建等人；属于唯心主义阵营的有王弼、郭象等人及《列子》书。南北朝时期的唯物唯心斗争表现为佛教与反佛教的斗争。”^{[2] (P156)}“理学（宋、元、明、清）这一时期的哲学和过去的几个历史时期一样，也贯串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3] (P158)}为什么说是权威性的教科书呢？1978年是恢复研究生招考的第一年，冯契先生指定的参考书就是这一本。日丹诺夫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的定义，为中国哲学史界继接受达三十年之久，以至我初入门时还得去学习它。这是建国以后政治全功能主义与阶级斗争为纲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上的体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完全陷于公式化，唯物与唯心的“两军对阵”就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内容。需要指出的是，此书的面世是符合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特定要求的产物。任继愈先生是无法超越出这一时代的，冯契先生当时也以此书为报考时的必读书，也说明了这一点。况且，任继愈先生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此书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功劳也不容抹杀。^[4]我也是啃着这三册本后成了冯契先生的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还与同室的李志林、施炎平、陈敦传等同窗讨论过，日丹诺夫定义还是不是要遵循？它有没有价值？这同当时学术界对这一定义的争论，是有内在联系的。

（二）

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来到，人们观念开始觉醒了。学者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两军对阵”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惟一指针。张岱年先生对日丹诺夫定义提出了责难。198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体现了张岱年先生的意图。张岱年先生对它是基本上肯定但又指明其不足，张岱年先生说：“哲学史又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日丹诺夫的这一定义有简单化的倾向，但是指出了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强调了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纠正了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贬低唯物主义的偏谬。这都是有益的。”^{[5] (P15)}张岱年先生断言，“我们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对立也贯穿于中国哲学史中。”^{[6] (P22)}一方面，张岱年先生反复声言，中国哲学自先秦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认为“对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也要有适当的评价。”^{[7] (P25)}“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可能有片面的合理的思想。分析每一唯心主义体系的复杂内容，可以从中学取有益的经验教训。”^{[8] (P61)}在阶级斗争为纲、“两军对阵”控制了人们思想达三十年之久后，张岱年先生的这些见解，确实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指引作用。因为以往人们对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一棍子打死的，是不及具体分析的。如果有一定要这样做，那就得冒个人政治上的风险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些对唯心主义作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的论文。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有耳目一新的感受的。张岱年先生指出日丹诺夫定义“简单化的倾向”后认为，“在哲学发展中，这两条路线也不是截然分立的，而有错综复杂、相互转化的情况。唯物论中含有唯心的观点，唯心论中也含有唯物的观点。”^{[9] (P71)}记得当时看到的论著中，有的主张朱熹、王阳明均有唯物论的因素，也有人主张朱熹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这同以往朱熹、王阳明为唯心主义者、朱熹为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有很大不同。这样研究的视野从形而上学那里解放了出来，代之以辩证的、与事实相符的视角。

张岱年先生说，这本书是据1979年对研究生授课时讲义整理而成的。应该说，在人们的思维被禁锢了三十年之久后，能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出来，作出人们尚不敢说的话，无疑是要有胆量与魄力的。在着对旧事物进行突破的初期，人们往往是傍着旧有的东西，并在内中寻求它的不足，这是历史上有着改革意识的人们的共同规律。做到这一点，就是时代的弄潮儿，就是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

（三）

比起张岱年先生来说，冯契先生采取了机智的做法，他不再把自己的独特见解与日丹诺夫定义直接发生瓜葛，而是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史定义。这体现198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全书否定了“两军对阵”的形而上学，但不排斥思维与存在关系是产生哲学基本派别的根源。全书共九章，章节目录中仅五处出现唯物主义的字眼，一处出现唯心主义的字眼。这部书虽出版于1985年，而授课的时间是在1978年10月至1980年1月间。从时间上与张岱年先生相一致，均是力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走出一条新路而努力。

冯契先生以为，哲学史就是人类的认识史：“我以为哲学史可以定义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辩证的运动。”^{[10] (P11)}

首先，冯契把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类的认识史，这直接否定了日丹诺夫定义。哲学史是为人类认识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同哲学家展开的争论相关的。就中国

哲而言，先秦有古今、礼法之争，天人、名实之辩；两汉为“或使”与“莫为”之争；贯串魏晋的是有无、动静、言意之辩，而隋唐则是在佛教的框架中继续了这一争论；至宋元明清，则演变为理气（道器）、心物（知行）之辩。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哲学作了一个总结。现在看来似乎是近于常识的东西，但从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其次，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摆脱了与阶级斗争相关的政治色彩。以往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大体是由四大块所组成，即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社会历史观。只不过分配到哲学家身上有所不同而已，有的是人性论突出些，有的是历史观丰富点罢了。这四大块无非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已。这种刻板的框框，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史，容纳在一个既定的、事先预设的公式中。既然是人类的认识史，那末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自身，必定构成了人类认识的客观对象。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积极成果就是科学。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冯契先生作了重点的分析，认为科学对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中国哲学中发展得相当充分的哲学派别，均有它的科学基础的。此后，对中国古代的科学哲学的研究，成为后来相当多青年学者的研究方向。于人对自身的认识方面，冯契先生提出了理想人格的学说，并对黄宗羲的豪杰精神作了专节的论述。他强调，中国古代哲学的优良传统，是同大哲学家的高尚人格分不开的。人格问题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眼球，并成为融哲学、伦理学、美学为一体的研究领域，也有不少成果面世。

三是起到了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让中国哲学史走上了独立的理论研究的道路。这种解放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一刹那轰动，而是体现为学术意义上持久性的效应。现今有不少挑大梁的学者，是沿着冯契先生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着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近在眼前，我不想多说了。套用冯契先生的话，“有所见也会有所弊”。冯契先生的研究，也有一些缺陷，主要的是把列宁赞同了的黑格尔哲学史观的一些主张，作为观察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哲学史是否由若干个小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是否就是如此整齐，圆圈说是否符合中国哲学史的实际发展，看来还得作进一步深究，不能贸然下此结论的。

参考文献:

- [1] 张岱年.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5、15、22、25、61、71.
- [2] 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史(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156.
- [3] 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史(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158.
- [4] 冯契.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85. 11.

注释:

1.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15页。中华书局, 1983。
2.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 第156页。人民出版社, 1966。
3.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 第158页。
4. 任继愈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一书, 尽管只出了四卷, 其内容丰富、资料详尽、观点新颖, 为同类著作中的翘秀。书中许多观点, 与此60年代那本已大相径庭。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第15页。
6. 《同上》第22页。
7. 《同上》第25页。
8. 《同上》第61页。
9. 《同上》第71页。
10.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 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On the Contribution of Fengqi to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definition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Zhu yilu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Arts and Law)

Abstract: The best contribution of Fengqi is to redefine the subject of history of philosophy. He though its subject was histor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which enlarged the study field of Chinese philosophy , got rid of the political tint about class struggle, and le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ake a independent road to academic study.

Key words: Fengqi; History of Philosophy

收稿日期: 2006-6-4

作者简介: 朱义禄, 男,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